

故宫的书法风流④

蔡襄在弹劾晏殊的上疏中说,当年李宸妃去世时,是晏殊写的墓志铭,但晏殊对李宸妃就是仁宗生母的事实“没不敢言”,稀里糊涂蒙混过去了。《宋史》为晏殊鸣不平:“(晏殊)以章献太后(即刘太后)方临朝,故志不敢斥言”。当时刘太后还活着,而且垂帘听政,有谁敢说实话呢?

当然,晏殊还有其他小辫子被蔡襄等人抓在手里,比如他私占官地,役使兵士为他建房子,这种贪小便宜、慷国家之慨的做法,与他的宰相身份实在不符。皇帝看罢上疏,觉得蔡襄说得有道理,就罢了晏殊的宰相,把他打发到颍州当地方官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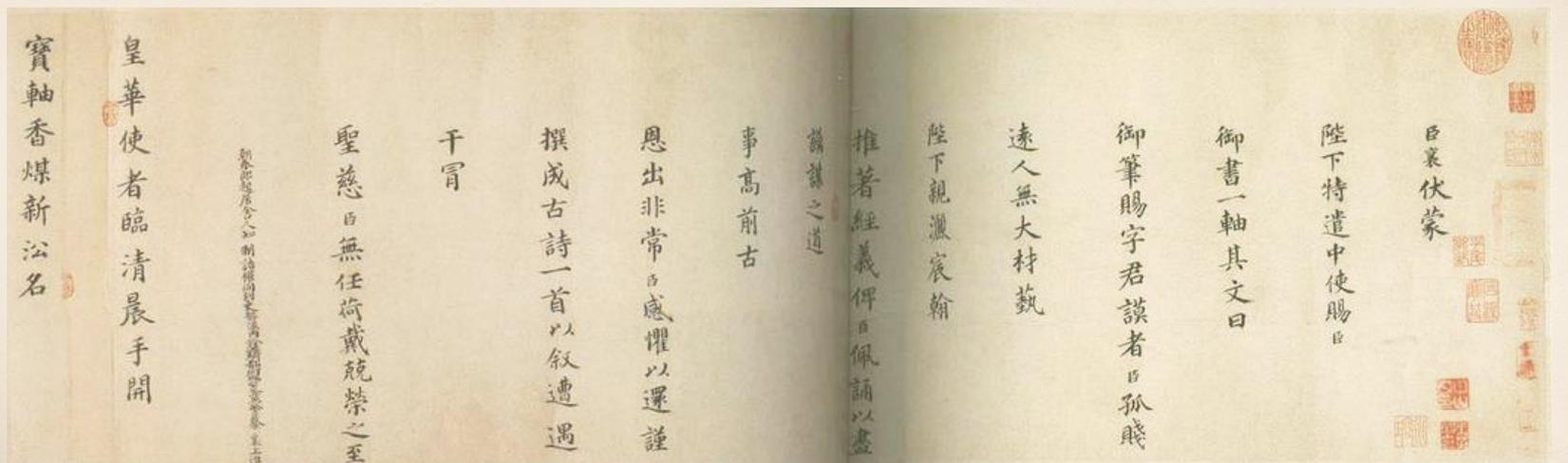
书法独步于世的蔡襄(二)

□祝勇



蔡襄像

好的书法和最好的书法,还是可以在毫厘之间,辨出高下。



《谢赐御书诗表》卷(局部),北宋,蔡襄(日本藏本)

心底无私 弹劾老师事出有因

晏殊自十四岁以神童入试,赐同进士出身,历任右谏议大夫,集贤殿学士,同平章事兼枢密使,礼部、刑部、兵部尚书,参知政事(副宰相),一路当到宰相,仕途可谓顺风顺水,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风流词人、太平宰相,这次被自己的学生弹劾出京,称得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那一年,他已经五十四岁,青衫飘飘地离开汴京,“满目山河空念远”,不知道此生是否还可以回来,再见到汴京的春天。时至今日,我们仍可想象他内心的怆然。

笔者喜欢晏殊词,是因他的词虽包含着悲伤,却不被悲伤所淹没,因为他内心的圆融、通达、开放、热烈,足以化解心头的伤悲,就像阳光,无声无息之间,可以融化冰雪。你看他写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,接下来一句就是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。

他写“满目山河空念远,落花风雨更伤春”,紧随其后的,却是“不如怜取眼前人”。对这世界,他没有太多的怨恨,而是抱着一种欣赏的心态。他能正视生命中的缺失与伤痛,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当下和未来得到弥补。这说明他是智者,他有强大的内心,也是他比李煜高级的地方。尽管五代南唐的后主李煜开一代词风,但相比于宋代的晏殊,格局还是小了,一天到晚哭天抢地、捶胸顿足、大惊小怪,满脸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宋词后来在欧阳修、苏东坡、黄庭坚、辛弃疾等人手里走向开阔和博大,离不开晏殊所做的铺垫。

明眼人一眼可见,“李宸妃墓铭”事件,不过是蔡襄弹劾晏殊的一个由头,真实的原因,是一年前由参知政事范仲淹发起的“庆历新政”,欧阳修、蔡襄都是积极支持者,对老范鼎力相援。与欧阳修、蔡襄同届“高考”的状元王拱辰,则是反改革的急先

锋,而老成持重的宰相晏殊,并没有选边站队。不久,晏殊因看不惯欧阳修锋芒毕露的个性,把他外放为河北都转运使,让改革派少了一个骨干分子。如此,蔡襄才把矛头指向晏殊,对他痛下“杀手”。

蔡襄的“个性”,其实在很多年前就“暴露”无余了。八年前的宋仁宗景祐三年(公元1036年),范仲淹因得罪当时的宰相吕夷简而被贬往饶州,左司谏高若讷高谈阔论,唾沫星子横飞,说范仲淹这家伙罪有应得,为朝廷的处置拍手叫好。

欧阳修写《与高司谏书》,痛骂高若讷“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”。高若讷气急之下,把信交给宋仁宗,宋仁宗一生气,就把欧阳修逐出朝廷,贬为夷陵县令,去基层当干部了。余靖、尹洙等谏官为范仲淹鸣不平,也无一例外地受到贬逐,台谏官员一时鸦雀无声。这个时候,该蔡襄挺身而出。他写下《四贤一不肖诗》,明目张胆地把范仲淹、欧阳修、余靖、尹洙这四位被打倒的谏官称为贤人(“四贤”),把大嘴巴高若讷称为不肖之徒(“一不肖”)。这五人,他每人送上一首长诗,以表明自己爱憎分明的立场,该赞颂的赞颂,该贬损的贬损。一时间,《四贤一不肖诗》洛阳纸贵,以地下文学的形式广为流传,“火”遍京城内外,甚至有契丹使者买到刊本,贴在幽州馆的墙上仔细欣赏。蔡襄在那样压抑的气氛中写下《四贤一不肖诗》,不仅仅是无惧吕夷简,对宋仁宗也没有谦让半分。

如此说来,蔡襄弹劾他的老师,并不说明他薄情寡义、“一点儿面子也不讲”,相反,这说明他是一位称职的谏官,因为他心底无私,他效忠的是皇帝,是天下,而不是某个人。他对老师“翻脸不认人”,源自他内心的干净、坦荡。

秉笔直书 直言宋仁宗“不能决断”

蔡襄的直爽性格,在皇帝面前也毫不收敛,说宋仁宗“宽仁而不能决断”,这话就是蔡襄说的,而且不是在背后嚼舌头,而是光明正大地写在给宋仁宗的上疏中。

宋仁宗虽然“不能决断”,但毕竟还是“宽仁”的,一直没有和蔡襄过不去。皇祐五年(1053年)正月十六,汴京城内突起大火,这场因道士醉酒引发的大火把存在了半个世纪的会灵观化为灰烬。反复犹豫之后,宋仁宗赵祯决定重修,起名为“集禧观”,意思是要把长寿、富贵、康宁、好德、善终集中在一起,之后,他又在西侧新建一座“奉神殿”,“奉神”二字,出自宋真宗所写《奉神述》刻石。宋仁宗决定亲自书写碑额,请蔡襄摹写宋真宗御书的碑文。

宋仁宗先是派太监张茂则把自己亲写的碑额“真宗章圣制《奉神述》并御

笔”送给蔡襄。蔡襄只要遵照皇帝的指示摹写碑文就可以了,但他爱提意见的“毛病”又犯了,看过碑额,又忍不住对皇帝做出“批评指导”:

一,去掉“章圣”二字,因为宋真宗的谥号是“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”,全写上去年数太多,简称又不恭敬,所以干脆不要。

二,去掉“御笔”二字,因为“御”是在世臣子不方便直呼当朝皇帝姓名而用的专用词,且古人极少用“御笔”二字。

三,建议名称定为“真宗皇帝制《奉神述》并书石”。

据说蔡襄把他摹写的宋真宗碑文呈送给皇帝时,皇帝是“拱立”着,毕恭毕敬地等在那里。而后,他又亲自写了蔡襄的字“君谟”二字,赐给蔡襄,以示恩宠,还将凤冠霞帔赐给蔡襄之母,此事被记在《宋史》中。

作诗表谢《谢赐御书诗表》流落海外

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有蔡襄《谢赐御书诗表》一卷,纸本,纵29.3厘米,横241.5厘米,共五纸,接缝处有“合同”印,上书三十七行,三百二十字。这一书法长卷,就是蔡襄在收到宋仁宗手书“君谟”的赐字后所写的谢表。明代书画家张丑在《清河书画舫》中对此手札写了一段按语:

仁宗深爱君谟书迹,尝御笔加赐“君谟”大字并诗,以宠异之。君谟作诗表谢之,自书以进,即此卷也。

蔡襄的法书真迹存世较多,仅北京故宫博物院,就藏有《自书诗帖》《虚堂诗帖》《纤问帖》《入春帖》《京居帖》《持书帖》《门屏帖》《暑热帖》《蒙惠帖》《扈从帖》《山堂诗帖》等。

台北故宫博物院,藏有《山居帖》《陶生帖》《思咏帖》《虹县帖》《安道帖》《离都帖》《谢郎帖》《大研帖》《脚气帖》《澄心堂纸帖》等。

这卷《谢赐御书诗表》,宋仁宗收到后藏入秘府,后来赐给大臣赵挺之,米

芾曾经看到过这件手迹,后来赵挺之传给他的儿子、词人李清照的老公赵明诚,到元代,像时间中的漂流瓶一样,“漂”到王芝、乔夔成手上,明代又为黄钟、赵用贤收藏,清初流入安岐之手,入乾隆内府,乾隆又把它转赐给六子永瑢,清末为端方所藏。1919年,中村不折从文求堂购得此卷,此卷自此流入日本。

徐邦达先生说,蔡襄《谢赐御书诗表》,除日本藏本外,清官还另藏有两本。其中一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,曾著录于《石渠宝笈初编》,临写极劣,还有项元汴等数印,“亦是出于翻摹”,如此,“此本当然不真”;清官的另外一本,有乾隆、嘉庆、宣统内府印玺,但不见《石渠宝笈》著录,此卷被溥仪窃盗出官,带到长春,伪满洲国覆灭以后,又流至北平,被一位姓李的收藏家收藏,卷上钤有“宣和殿宝”等伪印,“书法嫩弱光软,已成清代馆阁书体”,“纸亦染旧成灰墨色”,一看就不真,可能是清代康熙年间的临本。

《故宫的书法风流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